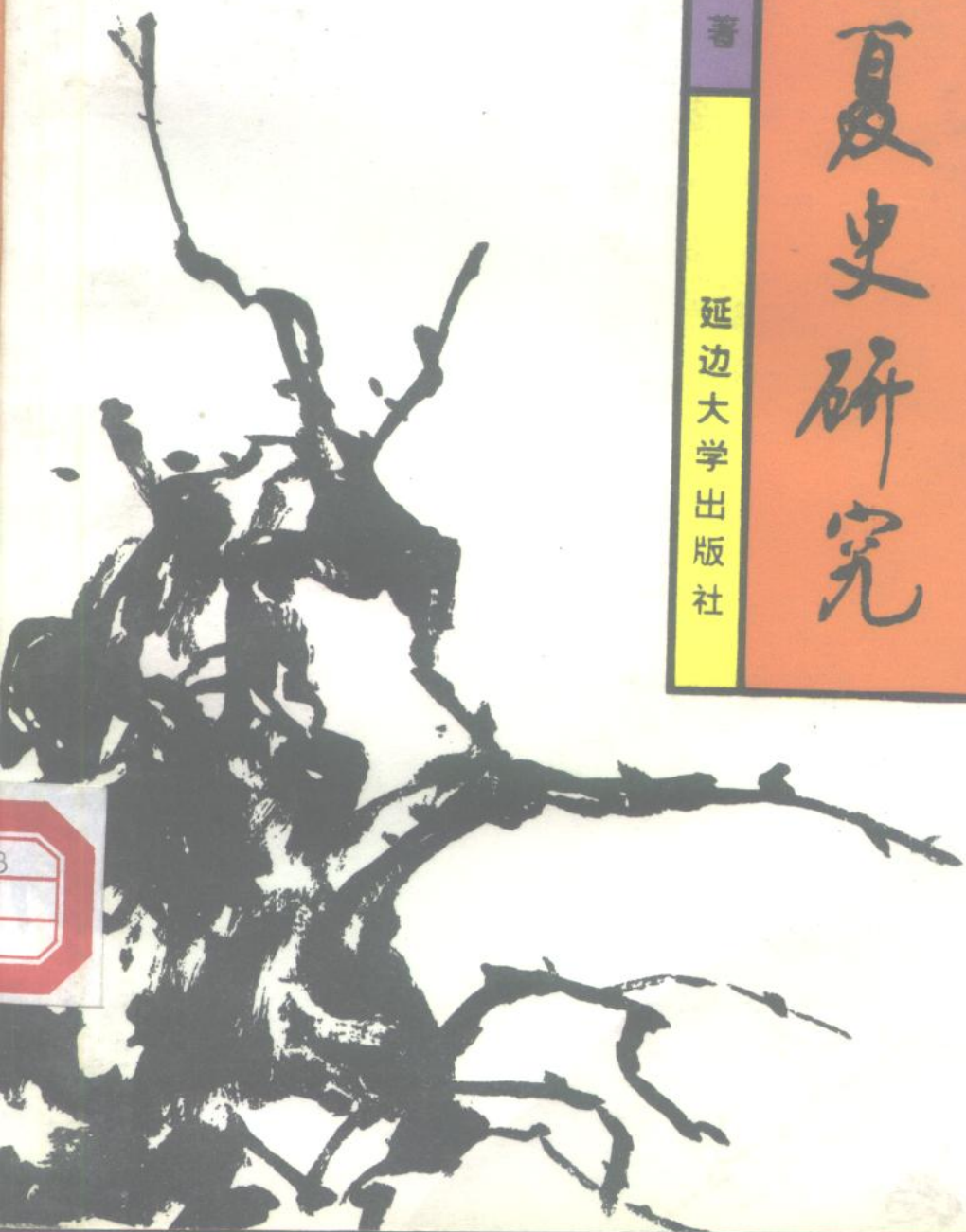


东夏史研究

朴真奭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金光星

封面设计:金胜铤

东夏史研究

朴真奭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院内)

延边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 150 千字 印数: 1—300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34-0813-4/K·53

定价: 10.00 元

前 言

13 世纪初,金朝人蒲鲜万奴乘金末元初的动乱之机,以我国辽河流域为中心建立了封建割据政权——大真国。但不久,便被迫离开辽河流域,迁移到包括牡丹江流域、图们江流域、绥芬河流域在内的“东土”,一般叫做大真国的东迁。蒲鲜万奴东迁后改大真国为东夏国,继续活动十六、七年,是我国历史上年代较短暂的少数民族政权。

东夏国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上,尤其在东北地方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由于《金史》未载蒲鲜万奴传,加上东夏国存在时间很短,遗留下来的史料极为稀少,史学界对东夏国了解甚微,许多问题尚处于众说纷纭的状态。

本书共由六章组成,内容有:大真国的建立和东迁、大真国东迁后的称号及其首都、东夏国官制、关于东夏国南京问题的学术讨论、东夏国南京遗址:城子山山城和土城村土城及其筑城年代、东夏国的灭亡及其余众的活动等。

本书设附录,收录有关东夏国史的部分古书资料。

笔者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延边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大力支持,得到原东北博物馆副馆长、著名考古学家李文信先生(已故)的诚恳指导和帮助。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研究员顾铭学同志对本书大部分内容作了文字修改,吉林省博物馆李莲同志和延边博物馆的同志们(朴龙渊、朴润武、许英子等同志绘图,陈桂英和吴桂顺同志拓片,李永哲和金正守同志翻拍)为本书解决了有关图片和文物资料,原延边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著名书法家温良老

师亲写本书书名,延边大学朝鲜问题研究所支助巨额出版费用,以便解决多年来迟迟未决的出版难问题。谨借此机会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笔者希望这本书能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东夏国史,弥补东北地方史的薄弱环节做出贡献。由于水平所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1985 年 11 月,初稿

1995 年 2 月,修改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大真国的建立和东迁	(1)
第一节 蒲鲜万奴封建割据政权	
——大真国的建立	(1)
第二节 大真国的东迁	(5)
第二章 大真国东迁后的称号及其首都	(15)
第一节 大真国东迁后的称号	(15)
第二节 东夏国开元位置考	(24)
第三章 东夏国官制	(36)
第一节 中央官制	(36)
第二节 地方官制	(39)
第三节 军事制度	(42)
第四节 年号	(46)
第四章 关于东夏国南京问题的学术讨论	(60)
第一节 关于东夏国南京及其位置的考证	(60)
资料论文:关于东夏都城的再探讨	
——兼与朴真奭同志商榷 景爱	(69)
第二节 关于东夏国南京的继续探讨	
——答景爱同志的商榷意见	(78)
资料论文:三说金末蒲鲜万奴东夏国的都城	
——答朴真奭同志 景爱	(95)
第三节 谈景爱同志《三说金末蒲鲜万奴东夏国的都城	
——答朴真奭同志》	(114)
第五章 东夏国南京城址:城子山山城	
和土城村土城及其筑城年代	(130)

第一节 “山城”及其遗物·····	(130)
第二节 “土城”及其遗物·····	(140)
第三节 “山城”和“土城”的筑城年代·····	(143)
第六章 东夏国的灭亡及其余众的活动·····	(146)
第一节 东夏国的灭亡及其原因·····	(146)
第二节 东夏国余众的活动·····	(152)
第三节 大同年号的归属·····	(155)

附录:东夏国部分古书资料

(1)《元书·蒲鲜万奴传》·····	(166)
(2)《新元史·蒲鲜万奴传》①·····	(167)
(3)《新元史·蒲鲜万奴传》②·····	(169)
(4)《蒙兀儿史记·蒲鲜万奴传》①·····	(169)
(5)《蒙兀儿史记·蒲鲜万奴传》②·····	(172)
(6)《蒙兀儿史记·蒲鲜万奴传》③·····	(175)
(7)《东文选·答东真别纸》·····	(175)
(8)《东文选·回东夏国书》·····	(176)
(9)《辽东文献徵略·王浚传》·····	(176)
(10)《元史·耶律留歌传》·····	(177)
(11)《高丽史·赵冲传》·····	(180)
(12)《吉林珲春县出土东夏铜砮码》·····	(181)

第一章 大真国的建立和东迁

第一节 蒲鲜万奴封建割据政权 ——大真国的建立

蒲鲜万奴(又云完颜万奴),金朝人,原效忠金朝,后叛金自立,建封建割据政权大真国。

1206年,蒲鲜万奴出任金军“副统尚厩局使”,与赛下,完颜达吉不等一起率金兵大败宋军于今河南一带,“诸军追击,至陈泽,斩首二万级,获战马杂畜千余,兵还,进爵,赐金币甚厚”^①。1211年,“蒙古自抚州进攻奉圣州,破之,遂至野狐岭(今河北省万全县西北),时金招讨使完颜九斤、监军完颜万奴等,率兵四十万,驻于岭下……”^②。

当时,新兴的蒙古统治阶级继续南下,对金王朝施加压力,而金王朝本身业已走向衰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越发激化,日趋四分五裂。

1212年,金国北边千户契丹人耶律留哥乘机起兵抗金,相继占据隆安(今吉林省农安)、韩州(今辽宁省昌图县)等地。耶律留哥有部众十余万,成“营长百里,威震辽东”之势。到1213年“三月,推留哥为王,……国号辽”,遂对金朝构成严重威胁。1214年,金宣宗派使者青狗以“重禄”诱降耶律留哥。耶律留哥不从,青狗也反戈叛金,臣属耶律留哥。同年,金王朝任命蒲鲜万奴为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奉命率40万大军,与耶律留哥鏖战于归仁县(今辽宁省昌

图县)北细河上。结果,金军大败,蒲鲜万奴“收散卒,奔东京(今辽阳)”。耶律留哥随即占据咸平(今开原),改咸平为中京,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③。

归仁县之战后(1214年11月),金宣宗“诏谕”奥屯襄、蒲鲜万奴、蒲察五斤,“曰:上京、辽东国家重地,以卿等累效忠勤,故为腹心,意其协力尽公,以徇国家之急。及详来奏,乃大不然,朕将何赖。自今每事同心,并力备御。机会一失,悔之何及,……惩前过以图后功。”^④可见,金宣宗接到败报后大失所望,要求镇守各将改正互不团结,各自为政的“前过”,“以图后功”。此时,金宣宗尚未怀疑蒲鲜万奴“有异志”。

但是,蒲鲜万奴早就有叛金意念。有人在归仁县之战以前便已“察其有异志”^⑤。归仁县之战后,他的叛金意念更加强烈。那时,辽河流域形势变幻无常。强大的蒙古军队虽曾一度攻占东京(今辽阳),但不久又回师辽西。1215年4月,金朝从中都(今北京)迁都南京(今开封),进一步降低了它对辽河流域的控制和影响。在此情况下,1215年春(3月以前),蒲鲜万奴终于公开揭起叛金旗帜,乘机“取咸平(今开原)、东京(今辽阳)、沈(今沈阳)、澄(今辽阳西南海城)诸州,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三月,万奴步骑九千,侵婆速(今鸭绿江下游北部地区)近境”,与金军作战^⑥。尽管这次作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但从澄州到咸平的广大地区暂归万奴所有。至同年10月,蒲鲜万奴在东京建立了大真国。

关于蒲鲜万奴自立的具体时间,中外史学界一直持不同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蒲鲜万奴在1214年4月已经“自称东夏王”^⑦;第二种看法认为,蒲鲜万奴在“乙亥(1215年)正月,遂据东京叛,自称天王,国号大真”^⑧;第三种看法认为,1215年春,万奴出征婆速地方以前已建立大真国^⑨;第四种看法认为,1215年10月,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⑩。

可以说,在上述四种不同看法中,前三种看法比较笼统,缺乏

科学根据。如日本学者岩井大慧认为《元圣武亲征录》中有关蒲鲜万奴于甲戌年(1214年)“复叛(蒙古),自称东夏王”的记载乃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并据此任意改变《元史》太祖本纪的有关记载,主张蒲鲜万奴在1214年4月已经“自称东夏王”。这种看法有悖于《元圣武亲征录》的记载,更是对《元史》中有关蒲鲜万奴自立记载视而不见。^⑪

清朝人屠寄据《金史》桓端传关于“贞祐三年(1215年),蒲鲜万奴取咸平、东京、沈、澄诸州,……三月万奴步骑九千,侵婆速近境”的记载,认为《金史》和《元史》本纪将蒲鲜万奴的自立系于此年十月为误。他说:“按万奴取咸平,桓端传但称贞祐三年,不著月日。然万奴之师,三月已侵婆速,则咸平之取,必在正月。且既取咸平、东京、沈、澄诸州,显然叛金,不称伪号,无以煽诱,则僭王改元必在是时。……其实取咸平与僭号改元事,皆在正月,非十月也。”^⑫

可见,屠寄根据《金史》桓端传,否认《金史》和《元史》本纪关于蒲鲜万奴在1215年10月建立大真国的记载,主张同年1月就已建国。其主要根据,就是蒲鲜万奴军“三月已侵婆速,则咸平之取,必在正月”,要叛金,“不称伪号,无以煽诱”等。笔者认为,屠寄的这种说法,似乎缺乏说服力。他偏重于桓端传的记载把蒲鲜万奴叛金活动的开始与正式建立大真国的时间混为一谈,凭空否定《金史》、《元史》关于大真国的建国年月的记载。屠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谓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主观推测。

尽管如此,日本学者箭内互仍原则上赞同屠寄的观点,只改“正月”为“春”。勿庸讳言,箭内互的看法同屠寄的看法并不二致,不足以使人信服。^⑬

笔者认为,《金史》、《元史》及其它文献关于大真国建国年代的记载是不可否认的,是正确的。下面,不妨摘录史书中的几段原文。《金史》载,“贞祐三年(1215年)十月壬子,辽东贼蒲鲜万奴僭号,改元天泰”^⑭;《元史》载,元太祖“十年(1215年)冬十月,金宣抚蒲

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⑮；《宋元通鉴》亦载，宋“嘉定八年乙亥（1215年）冬十月乙未……金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⑯。

上述记载虽表现形式不完全相同，但在大真国建国年代上则是完全吻合，一致认为大真国于1215年10月建立。至今，我们还没有任何根据证明它们是偶然的巧合，也不能说一本书错其它都跟着错。只能肯定地说，上述各书记载充分证明蒲鲜万奴并不是1215年正月或春季建立国家，更不是1214年4月以前便早已称帝，事实上他是1215年春开始叛金，10月正式建立了大真国的，这是不容置疑的。《金史》所载，宣宗“三年（1215年）九月，以王诤为辽东宣抚司（指蒲鲜万奴）参谋官”^⑰。这一记载进一步证明上述论点的正确。

注：

①《金史》卷113，完颜赛不传。

②《通鑑续编》卷20，宋嘉定4年闰9月条；《满洲历史地理》，东京，九善株式会社昭和15年版，第2卷，第226—227页。

③《元史》卷149，耶律留歌传。

④《金史》卷103，奥屯襄传。

⑤《金史》卷103，完颜铁哥传。

⑥《金史》卷103，纥石烈恒端传。

⑦岩井大慧：《蒲鲜万奴国号考》，载《东洋学报》第19卷，第4号。

⑧《蒙兀儿史记》卷31，“耶律留哥、蒲鲜万奴列传”第13；《新元史》卷134，蒲鲜万奴传。

⑨箭内互：《元代经略东北考》，商务印书馆，民国24年版，第82—85页。

⑩现在史学界多数人认为，蒲鲜万奴在1215年10月建立了大真国。

⑪拙著《论东夏国称号》，载《延边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⑫⑬《蒙兀儿史记》卷31，“耶律留哥、蒲鲜万奴列传”第13；《元代经略东北考》，第82—85页。

⑭《金史》卷14,宣宗本纪,贞祐3年10月条。

⑮《元史》卷1,太祖10年10月条。

⑯《宋元通鑑》,宋纪99,宋宁宗8,转引自《东洋学报》第19卷,第4号,第488页。

⑰《金史》卷14,宣宗本纪,贞祐3年9月条。

第二节 大真国的东迁

关于大真国的东迁,史学界的看法不一,过去有人否定它的东迁,认为大真国自始至终都在辽河流域活动^①,但多数人则主张大真国确实东迁,认为大真国虽在辽河流域建国,但很快就迁移到包括牡丹江流域、图们江流域在内的“东土”上,继续活动了16年之久。关于大真国东迁以前时期即大真国时期的疆域,也都认为只包括辽河流域,“东土”则根本不在其内,这是中外史学界的传统观点。

笔者认为大真国曾东迁过,而且大真国在东迁以前,即大真国时期的疆域不仅包括辽河流域,而且也包含了包括牡丹江流域、图们江流域在内的“东土”,其根据如下。

第一,1215年10月,蒲鲜万奴在东京(今辽阳)建立大真国,但它在辽河流域的地盘很不稳固。

当时,该地区的形势错综复杂,多种政治势力——金王朝的旧政治势力、以耶律留哥为首的辽国、蒲鲜万奴的大真国、以张鲸为首的集团、新兴的蒙古统治阶级等,都在这里割据一方,争夺霸权。尤其新兴的强大的蒙古统治者对辽河流域的侵入,成为各种政治集团命运的转折点。可以说,辽河流域是当时我国北部地区矛盾集中的焦点之一。

而包括牡丹江流域、图们江流域在内的“东土”地区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矛盾较为缓和。加之,金王朝正走向土崩瓦解,中央集权已名存实亡,对偏远的“东土”就更加无能为力了。

可见,对大真国来说,在辽河流域活动很危险,而占据“东土”则形势相当有利。因此,大真国从建国伊始就不仅注重在辽河流域争夺霸权,而且很重视“东土”建设。

第二,大真国在辽河流域无一宁日,经常在战争中挨打,迁徙不止。

据《元史》耶律留哥转载,1215年,耶律留哥在蒙古的支持下“破东京,可特哥(成吉思汗所派的蒙古人,在耶律留哥军中任副将——笔者)聚万奴之妻李仙娥,留哥不直之,有隙”^②。我们知道,蒲鲜万奴正式建国于1215年10月,又在该年受挫于耶律留哥军,不得不撤离首都,撤离时连自己的妻子都未能保住,十分狼狈。

又据《高丽史》记载,1216年7月,金东京总管府“奉圣旨”给高丽政府的移牒说,蒲鲜万奴“近被隆安府行省移刺全举大军征讨,旋不三月,应有贼徒尽行杀灭,虽有残零余党逃在山林,亡无日矣。”^③当然此移牒不无夸张,但1216年上半年蒲鲜万奴的大真国曾受到金军的沉重打击则是可以肯定的。

尤其据《元史》木华黎传记载,1216年秋,以木华黎为统帅的蒙古军大举向东南方扩张,占领了锦州、广宁等辽西各镇,而后再继续东进,终于“拔苏(今辽东半岛金县)、复(今辽东半岛复县)、海(今辽阳西南海城)三州,斩完颜众家奴。”这时“咸平宣抚蒲鲜等率众十余万遁入海岛”^④。看来,这个“海岛”并不是“黄海之某岛”,很可能是包括图们江流域在内的“东土”(后详述)。《元史》塔思传写道:“万奴自乙亥岁(1215年——笔者)聚众保东海,至是(指1233年——笔者)平之”^⑤,也许是一个佐证(黑点系笔者加)。

第三,解放以后,尤其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为大真国时期的疆域可能是包括牡丹江流域和图们江流域在内的“东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75年5月,在黑龙江省海林县发现了刻有“天泰二年六月日,北京行部造”字样的“万户王字号印”^⑥;1984年7月,在黑龙

江省牡丹江市北郊发现刻有“天泰二年二月廿五日，应辦(办)所造”字样的“古州之印”。^⑦

众所周知，蒲鲜万奴是于1215年10月在辽河流域“僭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的。“天泰”者，唯大真国(包括东夏国时期)使用之年号；天泰元年相当于1215年，天泰2年相当于1216年。

由此可见，1216年2月25日以前，在今牡丹江流域设立了即古州，离大真国的建立不到五个月；1216年6月以前在这些地区，还设立了北京行部，离大真国的建立只有八、九个月。

另外，在今延边地区发现的几颗铜印也引人注目。“九·三”解放后，在延吉市郊城子山山城发现刻有“天泰三年六月一日，南京行部造”字样的“南京路勾当公事之印”。^⑧这说明1217年6月1日以前，在今延边地区设有蒲鲜万奴的南京行部、南京路等行政机构，离大真国的建立只有一年零八个月。最近(1988年3月)，在安图县长兴乡发现刻有“天泰三年四月十八日，南京行部造”字样的“定国公夫人印”^⑨，这进一步证明南京行部早在1217年4月18日以前就已经存在，离大真国的建立只有一年半左右时间。此外，1976年在珲春市斐优城发现刻有“天泰二年三月日，□□所造”字样的“勾当公事天字号之印”^⑩。它的铸造年代较早，仅次于古州之印，离大真国的建立不到六个月。遗憾的是，它的铸造地点无从考证，所以不能肯定这方铜印是在延边地区铸造的，还是在辽河流域铸造后流入延边地区的。尽管如此，它仍引人注目。值得注意的是，设一个行政机构，划一个行政区，绝不可能是一两天的事，它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如考虑到这一点，就可以肯定包括牡丹江流域和图们江流域在内的“东土”归属于大真国的时间更早，与大真国的建立相距更近，这是不容置疑的。

根据上述一系列事实，笔者认为，大真国建国初期的疆域不只限于辽河流域，它还包括牡丹江流域和图们江流域在内的“东土”。

这为大真国的东迁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然,辽河流域和“东土”并不是连成一片的土地,中间还有许多地区属于金朝或其它政治集团,这是金末元初社会大动乱造成的。

关于大真国开始东迁的时间,史学界众说纷纭,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不同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在1216年10月以后或年末开始;第二种看法认为,在1217年4月或6~7月间开始;第三种看法认为,在1218年开始。笔者认为,1216年秋,木华黎军侵入辽河流域时,不少大真国人已迁移到“东土”,但大真国的政治中心仍在辽河流域,把它的政治中心迁移到“东土”的时间大致始于1217年早春。据《元史》太祖本纪记载,1216年“冬十月,蒲鲜万奴降(蒙古),以其子贴哥入侍,既而复叛,僭称东夏”^①。值得注意的是,《元史》本纪所记“既而复叛”究竟是何时?这个问题解决了,大真国东迁的开始时间便会迎刃而解。笔者认为,这个时间很可能是1217年早春,即1216年末以后至1217年蒲鲜万奴进攻金上京会宁府以前的这一段时期。其根据如下。

第一,史学界一般认为,木华黎的蒙古军在1216年冬仍驻在辽河流域,直到年末方才撤离,进行西征南伐的。可以肯定,蒙古军在辽河流域时,蒲鲜万奴是不会“复叛”的。

第二,据《金史》梁持胜传载,“兴定初(兴定元年为1217年),宣抚使蒲鲜万奴有异志,欲弃咸平(今开原——笔者),徙曷懒路(今图们江流域——笔者)。持胜力止之,万奴怒,杖之八十,持胜走上京……”^②。这说明“兴定初”,即在1217年早春,蒲鲜万奴与梁持胜围绕东迁问题大闹矛盾,当时蒲鲜万奴积极主张抛弃辽河流域,但显然还没有离开此地。

第三,据《金史》温迪罕老儿传载,“温迪罕老儿,为同知上京留守事,蒲鲜万奴攻上京,其子铁哥(《元史》太祖本纪说“贴哥”——笔者)生获老儿,胁之,使招余人,不从。铁哥怒,乱斫而死”^③。蒲鲜万奴进攻金上京的战斗,是在1217年4月以前发生的。这说明

1216年曾一度“入质蒙古”的蒲鲜万奴之子铁哥，于1217年4月以前已被放回，并参加了进攻金上京的战斗。可以说，只有铁哥回来以后，蒲鲜万奴才有可能“复叛”，蒙古绝不会因蒲鲜万奴“复叛”而放回铁哥。因此，蒲鲜万奴的“复叛”时间应在1216年末至1217年春蒲鲜万奴攻金上京以前，即大致在1217年早春。这个时间也就是大真国开始东迁的时间。

关于大真国的东迁路程，过去有不少人主张，大真国首先从辽河流域逃到“黄海之某岛”，后于1217年4月，重新登陆，进攻鸭绿江下游的高丽大夫营和金朝“婆速之境”，继续向东北挺进，遂到图们江流域的金朝曷懒路。^⑩仔细思考，这一观点有下列矛盾之处：

第一，按这种观点，大真国军早在1215年9月或在1216年9月前后就应“遁入”“黄海之某岛”。而《金史》梁持胜传却记载，“兴定初（兴定元年为1217年），宣抚使蒲鲜万奴有异志，欲弃咸平（今开原），徙曷懒路”，说明大真国到1217年仍在辽河流域。

第二，大真国的东迁并不是单纯的逃跑过程，相反却是边战边迁移的过程。1217年春，它首先进攻金上京（今哈尔滨东南白城），后又进攻鸭绿江下游的高丽大夫营和金朝婆速路。如果蒲鲜万奴已“遁入”“黄海之某岛”，从地理位置看，不可能采取这种打法，说明开始东迁时的出发点还是辽河流域。

第三，蒲鲜万奴“率众十余万，遁入”“黄海之某岛”，必然需要大量的船舶和相当水平的航海技术。而大真国在建国后一直不安宁，经常在战争中挨打，流浪各地。因此，几乎不可能设想在短时间内解决“遁入”“黄海之某岛”所需的船舶和技术。

第四，过去有些人说，“黄海之某岛”是朝鲜平安北道海岸的椴岛或身弥岛，但它们都是小岛；有人还推测它在我国辽宁省凤凰城的濒海地区，但这里更没有大岛；又有人说，它是辽东半岛复县西南海岸的长兴岛，但又几乎没有提出科学根据，长兴岛也并不是大岛。因此，在上述所有“黄海之某岛”中无法解决“十余万”（或数

万)人生存几个月的充饥之粮及其他生活用品。

鉴于上述事实,笔者否认过去不少人所主张的大真国的种种东迁路程,认为大真国的东迁并不经过所谓“黄海之某岛”,而是直接从辽河流域出发。笔者还认为,大真国的东迁路程可能不是一条,而是两条。

第一条,从北方迁移。1217年早春,蒲鲜万奴与梁持胜围绕东迁问题大闹矛盾,结果,“持胜走上京,告行省太平。是时,太平已与万奴通谋,口称持胜忠,而心实不然”。不久,蒲鲜万奴派兵(包括其子贴哥),“太平受万奴命”,用“内外相应”的方法“焚毁上京宗庙,执元帅承充,夺其军”,攻占金上京。此后,大真国军可能返回辽河流域,但也有可能继续向前推进,到达今牡丹江流域的金朝胡里改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势力范围。《金史》阿鲁真传所载蒲鲜万奴军与“承充之女,胡里改猛安夹谷胡山之妻”阿鲁真部队之间的攻防战(万奴军虽被败),也许能反映这一点^⑪。

第二条,从南方迁移。1217年春,大真国不仅在辽东北方,而且在其南方也采取了军事行动。如《高丽史》高宗4年(1217年)正月条记载:“甲申,金来远城(鸭绿江下游)移牒宁德城(朝鲜半岛西北部)曰:‘叛贼万奴本与契丹同心,若并军往侵贵邦其患不少,且为贵邦所击,则必奔还我国,苟犯贵邦,宜急报之,我即出军掩击’”^⑫。过了三四个月以后的“夏四月,……金万奴兵(大真国兵)来破大夫营(义州附近)^⑬;9月,高丽西北面兵马使“报:女真黄旗子军(可能是大真国军)自婆速府(鸭绿江下游北岸)渡鸭绿江来屯古义州城(鸭绿江下游南岸)”^⑭。又据《金史》阿里不孙传载,“是时(指金兴定元年,相当于公元1217年),蒲鲜万奴据辽东,侵掠婆速境。高丽畏其强,助粮八万石”^⑮。又沿婆速路北上,“转入女真故地”(或云:肃慎故地)。从中可见,大真国的东迁路程并不是只有一条,而是有两条,大致由南北两路同时进行,这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大真国完成东迁,大约是1218年12月以前。据《高丽史》记载,1218年12月“蒙古元帅哈真及扎剌率兵一万,与东真万奴所遣完颜子渊兵二万,声言讨丹贼,攻和、猛、顺、德四城破之,直诣江东城”。^{②①}应该提及的是,在《高丽史》中第一次出现蒲鲜万奴东迁以后的国号——“东真”,即东夏国;完颜子渊所率多达二万的东夏兵,为蒲鲜万奴亲自“所遣”;蒙古与东夏的联合部队先攻占和(和州,今朝鲜永兴)、猛(猛州,今朝鲜猛山)、顺(顺州,今朝鲜北仓)、德(德州,今朝鲜德川)以后,集中兵力进攻江东城^{②②}。从蒙古和东夏国的联合军攻占各城镇的路程看,他们无疑是从高丽东北部攻入的,而江东城位于大同江中流的朝鲜半岛西北部。如果蒲鲜万奴的大真国仍留在辽河流域,那么他们就不可能选择此路,会直接从高丽西北部攻入。可见,在此之前蒲鲜万奴已完成东迁,改大真国为东夏国了。

1233年11月,高丽高宗王给蒙古皇帝的信进一步证明上述论点。信中说:“丙子岁(1216年)契丹大举兵阑入我境,……至己卯(1219年),我大国遣师……来救,……一扫其类。小国(指高丽——笔者)……请岁进贡赋所便。元帅(指蒙古元帅——笔者)曰:‘道路甚梗,你国必难于来往。每年,我国遣使佐不过十人,其来也可赍持。以去至,则道必取万奴之地境,你以此为验’。其后,使佐之来,一如所约,……独于甲申年(1224年)使臣著古与不以万奴之境,而从婆速路(鸭绿江北——笔者)来焉”^{②③}。这说明1219年的“万奴之境”,已经与鸭绿江北的金朝婆速路有区别。

从上述一系列事实中可以看到,蒲鲜万奴的主力在1218年12月以前已基本完成东迁。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其残余势力继续在辽东南部活动。据《高丽史节要》记载,1222年7月,“东真兵万余,入静州(鸭绿江下游朝鲜义州附近——笔者)。初韩侁、多智之党,分配海岛,后皆遇还乡。至是,复引东真兵,入静州,遂侵义州。防守将军守延,与战,败绩。麟州人谋与敌通为内应,防守将军